



“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，演出曹禺的《北京人》。当年，小四姨是个胖妞，很有喜感。虽然不是主角，却是重要的配角。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，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，这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。看完话剧回家，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。不会分场，我全写‘独角剧’。人物一多就搞不清，我全写‘双人剧’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乐此不疲。父母看了我的‘编剧’，只是笑。因为我的取材，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‘对白’，所谈的问题，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。”

这是琼瑶在《我的故事》一书中对她1947年到上海后的生活的回忆。琼瑶在《剪不断的乡愁》一书中也写道：“当年在上海，我的小四姨正参加话剧团，演过《雷雨》，演过《北京人》！八九岁的我，跟着父母去看她演戏，看得津津有味！”由此看来，童年的琼瑶被曹禺的作品深深吸引，还受到激发开始了最早的剧本练笔。那么，琼瑶在她的生命中，是否见到过曹禺呢？

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见

面，主要因为他们的作品太不一样了。而且，我也没有见过相关的新闻报道。直到近日看到1989年12月《人艺之友报》上苏德新老师的《多年的心愿》一文，我才发现，我错了。

《人艺之友报》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，北京人艺编印的一份内部小报，一般是演出前在首都剧场分发给观众，也会在剧院工作人员中发放，或者提供给媒体和文艺研究单位供参考。小报主要登载剧院新闻、演出信息、演职员创作心得、话剧史话、剧评、校园戏剧活动等。摄影师苏德新老师和我所在的人艺公关部负责小报的编辑工作。小报后来由《北京人艺》季刊代替。

1989年，为纪念曹禺处女作《雷雨》问世55周年，北京人艺以全新阵容再次公演这部话剧名著，由夏淳执导，主要演员有顾威、龚丽君、濮存昕、吴刚、郑天玮、周铁贞等。10月26日，正在北京的琼瑶闻讯赶来观看演出，恰逢由医院请假出来回到剧院的

曹禺。在初次接触曹禺话剧四十

年之后，琼瑶终于见到了曹禺。五十多岁的她像“迷妹”一样激动不已，快步迎上，搀扶着老人坐下，反复说，自己青少年时代就阅读了曹禺的全部剧作，从而对剧本写作产生了兴趣，能走上创作道路也是得益于曹禺作品的影响。虽然在台湾看过《雷雨》演出，但在曹禺担任院

曹禺与琼瑶

黄中俊

长的北京人艺看到《雷雨》，琼瑶还是抑制不住兴奋。她紧握曹禺的手说：“能欣赏到您的名著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想见到您，是我多年的心愿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”曹禺对琼瑶的作品也是了解的。他说：“你在大陆拥有广大读者，由你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收视率很高。你的作品充满了民族精神。”陪同他们见面的是北京对外友协的同志。当时在现场的苏德新老师记录下了这珍贵的会面，还抓住机会请琼瑶签名。苏老师的女儿正读高中，是琼瑶的“迷妹”。得知琼瑶要来人艺，女儿高兴极了，拿出十几本琼瑶的小说交给苏老师，请他找琼瑶签名。

“女儿对琼瑶的签名本爱不释手，又把把这些书重读了一遍。”苏老师后来对我说。

这是琼瑶唯一一次与曹禺的见面。

那么，琼瑶的小四姨是谁呢？小四姨叫林榛，原名袁行正，是琼瑶母亲的嫡亲四姨。20世纪40年代，林榛开始从事话剧活动，曾演过曹禺的《雷雨》《北京人》《日出》等剧目。登上银幕后，林榛演过曹禺编剧兼导演的电影《艳阳天》，演过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等著名电影。

被称为“胖姐”的林榛，是中国最早的女特型演员，演的都是“重要的配角”，戏份最重的角色是《三毛流浪记》中收养三毛的胖太太宋瘦梅。林榛后期作了大量台词教学工作，孙渝烽、达式常、陈冲、王伟平等都是她的学生。后来，达式常在舞台上演过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，王伟平则演过琼瑶的电视连续剧《情深深雨濛濛》。

战局混乱时期，琼瑶失去了与小四姨的联系。1988年琼瑶首次回大陆探亲，才得以见到小四姨的子女。而那时，距离小四姨因车祸离世已经超过十年了。

方大同走了，消息来得猝不及防。其时，我做“沪港双城”音乐分享会正要开场，一位听众走上前来，说：“可以放一首方大同的歌吗？他也有上海香港双城故事……”

方大同在香港出道，但他童年曾在上海生活，上海元素多次出现在他的音乐创作里。他一直说上海是“第二故乡”。我最后一次见到方大同，也是在上海，2017年的冬夜，方大同邀我在内几位同行晚餐，将新人王诗安推荐给大家。王诗安在荷兰出生长大，曾参加《中国梦之声》，成绩四十名开外，方大同不以排名的标准看人看事，他欣赏且提携之。这回方大同走了，我在新闻里看到王诗安去大理送别方大同，那是含着泪水的知遇之恩。

当时，方大同还推荐给我们他在做的“艾美梦游”绘本。艾美是方大同创造的卡通人物，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传播“真善美”。当红歌手出书不新鲜，但跨界做绘本图书，是理想主义行为。后来他虽身体不好，但系列绘本一直没间断出版。方大同离世我方知，贾静雯的女儿就是艾美梦游绘本的忠实读者。真善美的种子播种在心田。

2017年相聚后再未见到，2020年后时间也好像被拨快，回忆起来，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再远回想，我在《上海电视》杂志工作二十多年间，采访接触过方大同多次，方大同有上海情结，我们是上海媒体，常会聊些“上海话题”。翻阅曾发表的文章，文字背后，好像还能看到方大同当时说话的表情，浅浅的笑。

他是在夏威夷出生，五岁那年跟父母来上海，就读天山一小。他在上海过得“上海”，和同学们一起上课、玩耍。有别于一般小朋友的是他吃素食，许多年之后，他脱口而出在上海吃过的美食：“烤麸、马兰头、汤团、茭白炒青椒、馄饨。”都是素净的上海味道。

上世纪90年代“出国潮”之中，方大同父母反其道而行之回国。方妈妈是为儿童教育工作回来，方大同开始音乐创作后，也为母亲所做的教材编写曲子、配音，做了很多歌手以外的工作。音乐上，方大同是个天才，天才靠直觉做事。没系统学过乐理的他所做的选择、所写的歌，都与众不同，也因此成为独一无二的方大同。我在自己写下的文章里，看到了曾在上海见到的、眼里的方大同：“他没有天才常有的桀骜乖张，安安静静，独守本我，锋芒都在他的音乐里，不随波逐流，不妥协让步。”

“这些年，环境越来越糟糕，我想呼吁大家保护我们的家园、我们的地球。”这是2014年《危险世界》唱片发布之际，采访里他说的话。当时未有他那么深的感受，十一年之后再，感触很不同。

记忆里还有件事，记得也和他聊过。话说，童年在上海，某天，方大同和同学在公园里玩，同学看到面前有片“草坪”，想要走上去，方大同着急地制止，因为当时中文不好，来不及阻止，同学一脚踏上“草地”，瞬间掉进水里！原来，方大同想表达的就是：“这不是草地啊，这是浮萍！”还好及时找到救援人员，有惊无险……这事促使方大同努力学习中文，他不想这样的事再发生。

这段往事，也似联系着他2014年所说的，那番关于“拯救环境”的迫切提醒。因为理想主义者的责任感，他努力地用音乐作品、绘本和一切身体力行的方式，进行着“拯救世界”的大声疾呼。就像当年对那个小男孩大呼：（浮萍）下面是水塘！危险！危险！

有人懂，有人不懂，或当时未懂，后来方方知。“我想呼吁大家保护我们的家园、我们的地球。”话犹在耳，方大同走了。但这个从夏威夷到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大理，爱音乐、友爱世人的男孩，走出的路、发过的声，不会消失。理想至上，精神不灭；爱与和平，世界大同。

在上海，遇到方大同

甘鹏



钱好啊

方英文



初年的《百家姓》里，钱姓紧随赵姓后排名第二，是有原因的。《钱氏家训》里有如此警句：

利在一身勿谋也，利在天下者必谋之。

花繁柳密处拨得开，方见手段；风狂雨骤时立得定，才是脚跟。

所以钱姓后人很是了得，不是通常所说的人才辈出，而是国士如豆，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钱学森、钱三强、钱伟长、钱锺书、钱穆，等等。姓钱，智商又奇高，缺钱的概率就很小。况且人家境界高洁，基本生存有了保障，便沉溺于志向一类的精神诉求，便可从生活的字典里删掉钱字。钱学森主动请降工资，便是例证。钱锺书调侃自己姓钱太俗，别人问他借钱，借一千他给五百，说不用还了，堪称文士里的宋公明。要知道钱借出去往往借出个仇人来，因为讨要钱时人家烦啊。不如直接给，一开始就斩断了债务关系。只是这种洒脱普通人没法学，唯有赞叹一声：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奔劳生计之众生，是永远抱怨钱少不够用的。就算中了彩票百万大奖，兴奋过后，又恨咋不是千万啊。所谓欲壑难填，专指物欲之壑。不过鄙人又想，假使世间没有个钱字，吾辈尔等又拿何物来钟爱一生不离不弃呢？谁又能找出比钱更好的替代物呢？找出了我便服他。或曰健康比钱重要啊！此为抬杠话偷换概念。

有位名人幼时兄弟姐妹多，生活颇为艰难，一生珍爱国财可以理解。名声一隆来钱容易了，凡活动邀请必先讲清出场费。一个发小搞展销请他去站台，他说这是商业活动，但念在发小就付钱吧，一万元。发小说没问题，活动一结束就付钱。谁知活动忙乱了，名人便每周打电话催要。催要了半年，那哥儿只得拿来一万元，进门将钱撒在地板上，说了五个字：“两清了，绝交！”“甭拿绝交吓唬人么，”名人立马弯腰拾起钱，像是捧着烤红薯般倒腾着，抚摸着，吹着，笑里含嗔道：“但你不该把钱摔地上，摔疼了钱人难受嘛！”

钱的释义好多条，既推动文明也派生罪恶。但钱的一条内涵是：钱是劳动的证明纸。依照这个定义，爱钱等于爱劳动，自是一个美德。

微信上一个帖子在问：十年前的衣服你还在穿吗？

有呀！我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

它说，我至少具有三大品行。一、你是长情的人。对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不会因为旧了过时了而丢弃。对衣服是这样，对人也会这样。二、你是自律的人。

谁说不在意

蔡旭

这么多年过去，体型还能保持基本不变。三、你是有主见的人。不会去追不断变化的潮流，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。

哦，我还有这么多优点，自己都不知道。正当我沾沾自喜的时候，却突然想起第三条——

原来，我并没有如它所说的那样。

在上海老城厢的历史上，曾经有条横贯东西的河流，它叫肇嘉浜，两头是大东门与老西门，肇嘉浜出大东门水门后就与黄浦江汇合了。据明万历《上海县志·卷五·津梁》记载此处有个黄浦江渡口叫肇嘉浜渡。后来，肇嘉浜填平筑成了复兴东路，肇嘉浜渡也朝北迁移，改称大东门码头，而将原先的渡口称为“老摆渡”。清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从这个渡口的外马路至上海城墙方向修筑了一条路，就以“老摆渡”谐音取了“老白渡街”的路名，1949年后，改为白渡路。白字更显雅气，外滩著名的外白渡桥，也是这样的成因。

从白渡路穿过中华路，有一条百米的小街叫金坛路，这也是一条因谐音而成的马路。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颁布“弛海禁令”后，上海很快就成为江海之通津，进出口关税及海关管理业务日益繁忙。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清政府决定苏松太兵备道主管海关事务，六年后，这个节度三府地区的军务与政务的巡道衙门移驻上海，道署设在大东门内，又称上海道。道署前原先马路盛家弄，就被改称“道前街”。1911年上海光复起义后，巡道旧址改为淞沪警察厅，道前街也随之改为“警察厅路”。1964年以后谐音改为金坛路。

上海历史上，曾经设置过两个道，明清各一个，清代的就是上述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。明代的叫“海防道”，它设立于明嘉靖三十四年，也就是上海建筑城墙的第二年，这个

道是一个驻上海的军事常设机构，主要是为了防御倭寇。后来，倭患基本平息，这里成了一个兵营叫右营游击署，坐落在上海西门内。在这个兵营东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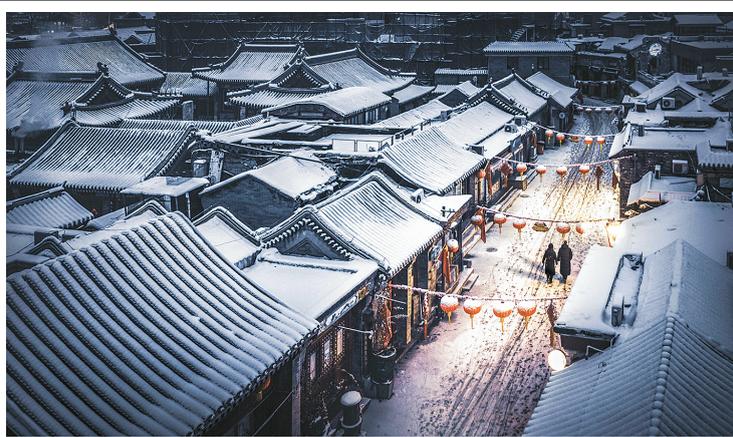
谐音让路名更有趣

吴少华

与北面各建了一座瞭望楼，建在北面的叫“截厘楼”俗称“望北楼”。因望北楼的外形高大，成了地标性建筑，久而久之，望北楼就成了一个地名。清同治《上海县志》记载：“嘉靖三十六年同知罗拱辰建署，北有截厘楼，东有镇远楼。后移驻府治，今铎庵后有梦花楼，其遗址也。”原来，在上海土语中，望北楼谐音成了“梦花楼”。人

们用此谐音是有道理的，小刀会事变后，上海文庙从小东门移到了这里，因为望北楼就在它的边上，“梦笔生花”成为一种合理的想象。后来，人们就把上海文庙北侧的路称为“梦花街”，现在已成老城厢里知晓度极高的网红老街。

上海老城厢的谐音路名不少，譬如大东门复兴东路原有座道观火神庙，门前的路就叫火神庙路，1964年以谐音改为和顺街。还有，萨珠弄（杀猪弄）、东西钩玉弄（狗肉弄）、大兴街（大新街）、曹市弄（曹祠弄），都是如此。陆家嘴有一条烂泥渡路，很多人以为以烂泥而成名，其实不是，原来这里的渡口最早叫“赖义渡”。



这张照片拍摄于2020年2月6日傍晚，北京的春节刚刚迎来一场降雪，空气中弥漫着湿冷的冬意，而街头巷尾的红灯笼却透出温暖的光辉，为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。我站在什刹海庆云楼的楼顶露台，俯瞰着烟袋斜街，静静等待着那个特别的瞬间。

夜幕降临，街道上的人流渐渐稀疏，地上的积雪被踩踏后泛着微光，映衬着路灯和商铺的暖色灯火。这时，我注意到远处一对夫妻正并肩走来，步履轻快而默契。他们没有急于前行，而是偶尔交谈几句，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迅速调整构图，将他们置于画面中心，同时利用街道

两旁的灯笼和雪地反光引导视线，创造出一种层次丰富的景深感。许多朋友看到后都说，这张照片有种浓厚的电影感，像是某个温暖而隽永的故事开篇。这或许是因为画面的光影关系、人物姿态和街道氛围共同营造了一种叙事感，让人忍不住想象他们的故事：是刚刚吃完团圆饭一起散步？还是在讨论新年的计划？

我一直认为，摄影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捕捉转瞬即逝的真实瞬间，同时又赋予它一种情绪和故事感。这张照片就让我感受到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夜，北京的春节依旧充满温情，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陪伴，才是最动人的景色。

七夕会

背影

申然

摄影

